

道明會玫瑰省 戴剛德神父在臺傳教紀略（上）

撰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楊嘉欽

摘要

戴剛德神父（Constantino Montero Alvarez, 1909~2007），西班牙人，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會士。1934年來臺傳教始，在臺傳教七十三年。

本文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著重於戴神父家庭狀態、生長背景、修道生活等經歷。

第二部分則描述戴神父1930年代晉鐸後來到日治時期的臺灣，開啓他在臺灣傳教的開始。此時期藉由他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當時臺灣中部地區的生活情景。1930年代後期臺灣漸漸進入戰爭狀態，日本人開始實施物資管制，對於臺灣天主教，開始將教會領導者轉由日人神職來接替，對於在臺的外國神職進行監視。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進一步強迫他們遷移至鄉間，限制他們的傳教活動。

第三部分則是1945年以後的情況。二二八事件時，戴神父也曾以神父及外國人的身分保釋被懷疑的信徒。隨著大陸淪陷，1950年代中外修會與神職陸續來臺，離鄉背井加上美援的影響，信徒人數也大增；另一方面，臺灣天主教的傳教單位與教會管理也開始產生變化，各個教區陸續建立，修會劃分傳教區，部分修會或神職接管新成立的教區，西班牙道明會在高雄教區領導權則移交給國籍道明會士。戴剛德神父擔任臺灣區會長任內，也成立了以國籍道明會士為主的中華道明會，西班牙道明會士則開始前往高屏山地鄉或客家地區傳教。

本文乃是依據筆者於1997年七月與戴剛德神父進行五次的訪談紀錄，輔以當時臺灣歷史發展與天主教在臺發展的時序寫作而成，藉由戴神父的眼光或實際參與來觀察臺灣的社會變化與天主教在臺灣的發展。

前言

戴剛德神父（Constantino Montero Alvarez, 1909~2007），西班牙人，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會士。1934年來臺傳教開始，2007年病逝高雄，在臺傳教七十三年，2002年內政部頒發「外僑永久居留證」給戴神父。

筆者於1997年七月開始，每周一次前往屏東市公園路天主堂與戴神父進行訪談，連續進行了五次訪談，之後因戴神父需要進行其他工作，訪談因而停止。

筆者將與戴神父訪談結果，寫作成本文，文章結構主要以戴神父在臺灣傳教活動為主軸，輔以當時臺灣歷史、社會背景的描述，藉由戴神父的經歷，意圖完整呈現道明會在臺灣日治、戰後等時期傳教的狀態，也同時透過戴神父一位外籍天主教神職的眼光，觀看當時臺灣社會的情況。

一、出生

「我家鄉的風景是西班牙中最優美的，前面面對的是大西洋，後面則是坎塔布里卡山脈（Mt. Cantabrica）。這邊的人家多以牧牛業為主，因此酪農業特別發達，時常可以看到滿山的牛羊；同時因為濱海的關係，此地的居民從事漁業者也很多。小時候可以看到火車，順著蜿蜒的山勢緩緩前進，而且可以看到火車，在山坡上的三個地方『突然』的出現。」

這是戴神父對西班牙北部的Asturias地區景觀一角的描述。1909年9月4日戴剛德神父就是在這裡的一個小鎮巴加瑞斯（Pajares）中出生的。

戴神父家中有十二位兄弟姊妹，自己排行老四，經過了這麼多年，如今只剩下一位姊姊布拉（Pura Montero Alvarez）和三位弟弟若瑟（Joseph Montero Alvarez）、馬利安諾（Mariano Montero Alvarez）、馬奴爾（Maruel Montero Alvarez）。

童年時期

父親方濟各（Francisco Montero, 1873~1956）在西班牙的鐵道部，擔任巡視鐵道的工作。父親因為工作是巡視鐵道，有時須到較遠的地方去，所以常不在家。同時也因為

父親工作的關係，家也跟著搬來搬去，最先兩個地方巴加瑞斯（Pajares）和拉菲加（La Frecha），隨著西班牙鐵路的電氣化，原有的火車站及員工房舍已拆除了。

在戴神父12歲離家前，最後居住的地方是現今的甘布馬內（Campomanes），之後因為父親升職，舉家遷到西班牙北部的大城市奧維耶多（Oviedo）。雖經歷多次搬家，仍大多是在Asturias地區。房子是鐵路局的員工宿舍，都在火車站的附近。上學都是坐免費的火車。也因為父親在鐵道部的關係，戴神父的兄弟們也都是經由這層的關係，進入鐵道部工作。

戴神父回憶到他的父親巡視鐵道的工作，夏天還好，冬天時，因為西班牙北部多山，而且會下雪，在這樣的天氣下工作非常吃力，但是為了家計，還是必須前往，可說是非常的辛苦。戴神父還說，他自小沒有受過沒衣服穿及沒東西吃的日子，應該感謝他父親工作的辛苦。

戴神父的母親瑪莉亞（Maria Alvarez，1882~1944），在他的眼中，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女人。每當戴神父談到其母親時，眼神中總是流露出對母親深深的感謝和懷念。

他的母親除了日常一般的家務外，對孩子們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也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母親也教導子女們認識天主教的道理，每逢周日就帶著子女去教堂望彌撒，使子女們對於教會信仰能更加的瞭解，而這也是後來戴神父決定從事神職人員的一個重要的鼓勵因素。

戴神父的外公馬蒂亞（Madia Alvarez）住在La Frecha，戴神父有一段時間便是住在這個小鎮。他的外公的工作是巡視公路的維護狀況。他擁有牧場，並且養了許多的牛、羊，其中有一部分就分給戴神父的母親，而戴神父的工作是每天早上必須到外公住的地方擠奶，帶回來給父母親喝，這種工作遇到下雪天，便會很辛苦。縱然如此，還是很喜歡這樣的工作。



圖1 戴剛德神父乃玫瑰教堂第二十四任神父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老照片數位博物館」館藏（總登錄編號：cca100062-hp-kh2003_008_030r-0001）

戴神父小時候，就是在外公的產業上玩耍，據其所言，可能因為這樣的生活，所以他的身體都很好，小時候不曉得什麼叫做生病。後來到了臺灣的羅厝庄時，因為臺灣天氣熱，睡覺時流汗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因為這樣受了風寒，這才第一次經驗什麼叫做「感冒」。

由於戴神父的多山，當地又以畜牧業為主，經常可以看到滿山的牛、羊。戴神父就很得意的說，當時他幫忙外公牧羊，只要回家時，一喊，羊就會認得他的聲音，然後聚集到他的身邊一起回家。

雙親的過世，在戴神父的心中，是一個永無法磨滅的傷痕。戴神父的母親於1944年過世，享年62歲。因為戰爭的關係，兩年後，即1946年，才經由當時正在西班牙的李安斯神父（Elias Fernandez, 1899~1956）寫信告知。

父親於1956年過世，享年83歲，當時戴神父正在旗山地區開教，未能回去看他的父親。雙親的過世，對12歲就離家的戴神父來說，都未能在他們的身邊，無疑是其心中永遠的痛。當戴神父談及此時，眼眶中也隱約的泛出了淚水。

二、修院的生活

在戴神父的記憶中，童年的時期似乎過得非常的平凡，而且時間也過得非常的快。因為在12歲時就開始他為教會服務及奉獻的一生。

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國家，天主教徒在其國內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因為如此西班牙的教堂、修院林立，成為西班牙的一個特色。據戴神父回憶道，Asturias地區有一非常著名的天主教朝聖地——科瓦東加（Covadonga），每年都有許多人前去朝聖。當時，當地擔任神父的人非常多，其中有許多位出生於當地的道明會神父都曾經被派往臺灣傳教。



圖2 1862年（同治3年），天主教在高雄地區建立「首座教堂」，即圖中的建築。1928年（昭和3年）重建，為今之玫瑰天主堂。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老照片數位博物館」館藏（總登錄編號：cca100062-hp-cp2003_009_023ss-0001）

當神父的動機

戴神父從小生長在這樣對天主教信仰極為虔誠的環境中，耳濡目染之下，勢必對其日後的成長有所影響。而戴神父也說他今天會當神父，另一個因素是受到了他母親的影響。因為他母親非常注意子女的信仰生活。而且戴神父的叔公法蘭提諾（Flintino Fernandez）、舅舅馬奴爾（Maruel Alvarez）和阿姨坎蒂雅（Candida Alvarez）中，一位是道明會的神父，一位是教區神父，一位則是修女。

當神父的叔公、舅舅經常來到他的家中，向外甥們講解天主教的教理，這深深的吸引著戴神父當時幼小的心靈。當時鄰居的兩個小孩要去當神父，父母親經由交談間得知，也同意自己的孩子去當神父，所以在小學畢業之後，就在舅公的安排之下去神學校讀書，就這樣戴神父自此就開始他的苦修生活。

苦修的日子

1921年戴神父和4個鄰居的小孩一起前往西班牙中部的巴利阿多利德（Valladolid）的一間La Mejorada神學校就讀。這間神學校主要是以培養出國傳教教士和學童的「聖召」¹為目的，早期到臺灣傳教的道明會神父許多都是從這裡畢業的。

在這裡的4年中，所上的課程是一般的學科教育，假日時才上一些有關神學的課程。學校要求的非常嚴格，不行擅自回家，都必須住校，對學生的生活也非常要求。而且學校的課程也是同樣的嚴格，戴神父回憶說，許多的小孩，都因為無法忍受這樣的嚴格方式，而離開學校。當時同行的四位鄰家小孩，後來只有2人有成為神父，其中一人叫拉密羅（Ramiro Abella），他到越南傳教。後來越南淪陷後，他就調到羅馬道明會總會，前幾年才過世。

經過4年嚴格的訓練和學習，戴神父終於結束了這一階段的訓練，他非常感謝天主保佑他能通過這些的考驗。但是，雖然這一階段結束了，但只是暫時的，馬上又要去面對另一個新的更嚴格的环境。

1 所謂「聖召」，乃是天主教的用語，其意即是，從事神職人員為天主服務，將祂的道理傳給世人。天主教方面認為每個人心中都有隱藏著聖召，必須透過靈修的訓練及生活，將這聖召培養出來。

1925年在結束神學校的生活之後，接著便正式的進入位於西班牙中部的阿維拉（Avila）的聖多瑪斯（Santo Tomas）修院中，正式成爲一位道明會的修士，開始修士的生活。

在阿維拉的第一年，仍是處於磨練的階段。每天天未亮，修院就敲鐘叫所有的神職人員及修生們起床，起床後利用十分鐘的時間盥洗、換上會服，然後到修院中的小聖堂去早禱、望彌撒，之後吃早飯，早餐只有一些麵包和一小盒的巧克力而已，連牛奶也沒有。

早餐之後，就回到自己的房間整理內務、讀書等，等到要上課的時間就去上課，或其他一些修院中的工作。在這段時間中都不能隨意的說話，每天只有兩次准許修士們到修院的庭院中活動，一次是午餐後半小時；一次則是下午一個小時，其他的時間都必須待在房間之中，不得任意走動。

這樣一直待到傍晚7、8點左右便到修院中的大聖堂去做晚禱，結束後才去吃晚餐，這個時候大約是晚上9點左右，此時也不能隨意的說話。晚餐後，神父就到神父的集會地去，而修士們則到自己聚會的地點談談話，每天晚上10點準時敲鐘就寢。修院嚴格要求修道士的日常生活，並且必須住在會院之內，不得隨便外出，整理自己的心靈，準備學習道明會的精神。修院對修士的要求非常的嚴格，如果有犯錯的話修院中的神師會處罰，輕則如到聖堂中罰跪，重則禁止一天兩次的休息，不能到修院外透透空氣，甚至逐出修院。

在修會嚴格的要求之下，有許多人也因禁不起考驗而離開。戴神父也不諱言的說，那樣的生活，連他自己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非常的苦悶，而且不能回家去探望父母，那樣的心情，一般人真的是無法忍受的。

阿維拉的冬天非常寒冷，因為當時雖然有電燈，但是卻沒有保暖的設備，也沒有自來水可以洗臉，所以只有事先用臉盆裝水以備隔天起床時盥洗用，但是因為天氣太過寒冷，隔天起床臉盆中的水已經變成冰塊了。

晚上讀書時還要用羊皮作成的袋子，將腳伸進袋子中才可以保暖。當時修院中都有圖書館，其中有許多的用羊皮寫的古籍，戴神父說當時他們都會將這些書借出來，晚上睡覺時，將這些羊皮卷鋪在床上，加上修院給每個人的兩件毛毯，這樣子晚上睡覺才會覺得溫暖、舒服。

一年之後，即1926年發大願（乃是神貧、服從、守貞），正式成為道明會會士。也開始學習哲學，當時同窗只有19人。可見當神父並不是想像中的容易，仍是必須經過層層的考驗與磨練，能忍受這種艱苦生活的人才有機會成為神父。

回憶到此，戴神父就有點感慨的說，現在臺灣的神學校對於修生的要求越來越放鬆，想回家就回家，根本無法激發出修生吃苦的毅力和培養聖召，因此訓練出來的神職人員，對於傳教事業因為怕辛苦，而變得不積極，使天主教的擴展較不如以前的成效大。

談到修院的生活，戴神父就說，現代的人太注重享受，不喜歡當修道人，如西班牙的薩拉曼卡（Salamanca）中有早期的大學和道明會的修院，在修院中有二百多位的神父，飯廳非常的大，也非常的漂亮，但是現在卻沒有多少人。

戴神父又說，修道生活在天主教會中是非常重要的，經過修院的歷練，已經成為一個自然的物體，超越一切，已不是單純一個世俗的人，而是全心為天主服務，這其中的問題便是一個人對修道生活的接受程度，如何按照神師們的命令，無條件之下作為一個修道人，全心全意的去做。他非常欽佩教會早期埃及提倡修道生活的人，如聖安東尼。

說到這裡，戴神父就說了一個他聽說的故事，高雄前金教區有一個信徒叫做陳金木（臺語音譯。後來戴神父到旗山開教時，他也前去幫忙，並發生了一些故事，後述），他非常熱心教會的事務，信仰生活也非常的虔誠。

他非常喜歡讀一些有關早期西方基督教教士隱修生活的書籍，也非常嚮往。

一天，他去找當時的本堂神父李安斯神父，說他要搬到山上去，學習那些修道人的生活方式。李安斯神父告訴他說，他沒有辦法過那樣子的生活，陳金木還是執意要去，不理會李神父的勸告，逕自前往山上去過他的隱修生活。

一星期後，陳金木回來了，他告訴李神父說，那種日子實在太苦了，吃不飽，晚上睡覺有蚊子叮，非常難受。李神父就說：「我早就跟你說過啦，你不適合過這種生活



圖3 玫瑰天主堂的青年會

資料來源：楊嘉欽提供

就偏不聽。」由此可以想見修道的生活並不是隨便就能過的。

1929年，戴神父轉到西班牙中部的大城市——多勒多（Toledo）中的村莊歐卡納（Ocana）的聖道明（Santo Dominic）修院，在1929~1930年間在這裡學習辯證學（apologetics），學習如何為教會的要理與教外人辯論。

戴神父認為辯證學對於一個傳教人員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則無法將教會真正的意義表達出來，也無法站在教會的立場為教會辯護。所以戴神父也說到，現在的傳教人員多未經過這樣的訓練，所以在山地鄉的傳教多不及新教的成果來的好。

1930年又轉到美國的玫瑰神哲學院（Rossaryville）進修，在這裡除了學習神學外，也順便學習英語。在美國，離家更遠，更沒有一個親戚在這裡，但是經過這麼多年，戴神父已經將其一切獻給天主，不再會受到心情的困擾。

1934年戴神父經歷了多年來的考驗與磨練，終於達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關鍵——晉鐸成為道明會的神父。而在修院的這些年，他學習到了傳教的方式和傳教的信念，修院嚴格的生活，更加強其信仰的堅定，也促進其更瞭解了教會的真正意義，所以現在他就要去貢獻他的所學——天主的道理——傳給世上每一個人。同年就在道明會玫瑰省的派遣下準備前往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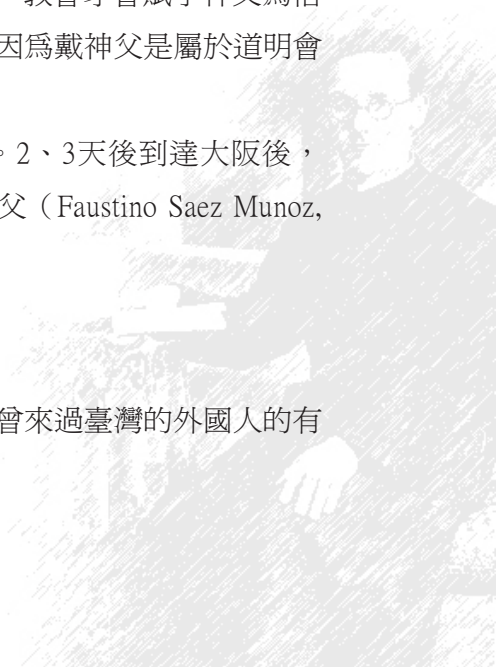
三、漂洋過海來臺灣

1934年戴神父成為神父之後，還要經過測驗，測驗通過了，教會才會賦予神父為信徒辦告解的權力。之後便開始分派神父們到各個國家去傳教，因為戴神父是屬於道明會玫瑰省，所以他的傳教區域便以東亞地區為主。

同年，戴神父和幾位神父們，從美國搭船前往日本大阪。2、3天後到達大阪後，戴神父隨即就接到馬尼拉省會長來的電報，派遣他和包德良神父（Faustino Saez Munoz, 1908~1987）一起前往臺灣傳教。

初抵臺灣

在來臺灣之前，戴神父對於臺灣的印象，多是來自於一般曾來過臺灣的外國人的有



關著作；另一則是來自於來臺灣傳教的道明會的神父們，他們回國或者寫信，將他們在臺灣傳教時的所見所聞，告知在西班牙的其他神父們。而這些的著作或是口述，對於臺灣大多是認為臺灣不進步、民心浮動、社會不安定……。

但是這些對臺灣的描寫，都無法超越戴神父和同行的包神父前往臺灣傳教的衝動和喜悅。

1934年12月13日船在基隆靠岸，當時有兩位道明會的神父洪羅烈神父（Angel Rodriguez, 1873~1945）及楊多默神父（Thomas De La Hoz）在港口接他們。當戴神父下船時，他的心情感覺非常的喜悅，他「感覺」到臺灣進步很多，完全不是以前經過他人對臺灣描寫的刻板印象，所呈現出的是一種新的面貌。

羅厝的傳教

同年十二月，戴神父就到臺灣中部的羅厝庄的天主堂（今彰化縣埔心鄉羅厝村），與陳若瑟神父（Jose Arregul, 1903~1979）學習臺語。並且學騎腳踏車作為傳教的交通工具。戴神父在羅厝天主堂有三個時期分別是：1934~1935、1937~1941、1947~1950。

當時羅厝天主堂兼管員林（彰化縣員林市）、面前崙（今彰化縣竹塘鄉面前崙村）、蕃子田（今彰化縣二林鎮香田村）、大東等堂口，因此神父們每星期必須輪流到各個堂口做彌撒。舉行彌撒時是用拉丁語，而不是用臺語，²並且必須由傳道員向信徒解說彌撒各階段的意義及帶領彌撒的進行。由此可見在臺灣天主教的傳教史上神父和傳道員之間的密切關係。

說到此，戴神父就感慨的說，現在的天主教會太注重及要求禮儀方面了，而忽視了道理方面的重要。教堂每個禮拜都要做彌撒，但是



圖4 由愛河遠眺玫瑰教堂一景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館藏
（登錄號：KH2009.003.229）

2 當時及之前來臺傳教的道明會神父，他們做彌撒都是用拉丁語，而不是用臺語。

平時教堂卻也都沒有傳教員來講道，使整個教會對於道理方面的不重視。神父們也只固守自己的堂口，不向外擴展傳教，這都是現在天主教傳教成果不彰的原因。

羅厝庄的生活情形

在戴神父剛到羅厝庄時，因為當地是一小村莊，房屋多是竹造的，當時只有煤油燈並無電燈，而且物資非常缺乏。如外國人喜歡的食品有麵包、啤酒、蕃茄……等東西幾乎沒有。

戴神父回憶說，當時臺中只有一間麵包店，若有機會前往臺中時，才會帶一些回來，平常就用麵餅代替。啤酒在當時剛有日本的KIRIN、SAPPORO等啤酒廠牌輸入臺灣，只有日本人和外國人會喝，臺灣人則不喝啤酒。

當時當地的衛生也不是很好，也沒有自來水，廁所多設在屋外。戴神父前往有生病或喪事的信徒家中做禮儀及辦告解時，因為信徒家中為方便病人上廁所，就放置便桶，時間一久就會產生惡臭，戴神父因為無法忍受這種臭味，就必須以抽煙的煙味來抵抗惡臭，久而久之就養成了抽煙的習慣。

當地的信徒非常歡迎新神父的到來，神父出外去訪問信徒時，信徒經常會邀請神父到家中吃飯、喝茶，尤其特別對年輕的神父更是如此，使剛到臺灣的戴神父不會感覺孤單。

羅厝庄的信徒在當時有一千多人，幾乎全村都是信徒。他們多是以農為業，白天工作，晚上則到教堂去聽傳道員或神父講道。當地的男信徒更組織西樂團，俗稱「西梭米」，也是利用晚上練習，女性青年也組成教會的婦女團體。戴神父說道，當時每天晚上教堂都非常的熱鬧，成為居民聚會的地方，神父並且教信徒學習拉丁文和羅馬字。

戴神父提到，1905年當時的羅厝庄的馬守仁神父（Manuel Prat）³在羅厝天主堂內曾成立傳教學校。馬神父為了傳教學校曾請求菲律賓多瑪斯大學贈送印刷機，學生一方面研習教理，一方面排印羅馬字臺灣語祈禱書、公教要理問答及其他教會經典，分發青年研讀，充實傳教工作。畢業生分派各堂區傳教，成績非常優異。

後來馬神父為加強並提高傳教學生的素質和水準，於1915年將傳教學校移轉至臺北

3 馬守仁（或稱馬柏達）神父於1915年升任廈門教區主教，任內培養羅厝信徒涂敏正（1906~1982）前往廈門白水營神學校就讀，後來進入香港華南大神學校就讀、晉鐸，成為第一位臺籍教區神父。

蓬萊町天主堂開課。後來田中天主堂也運來一印刷機，印製一些經文和興辦教會刊物《良牧報》，發行全臺灣，繼續羅厝天主堂未竟的事業。

國民政府來了以後，中部教區歸美國天主教瑪利諾修會管理，但是政府禁止天主教和基督教使用羅馬字和日本話，所以這些刊物、經文和印刷機，也不知其流向何處。

戴神父在這裡就說，國民政府來了以後，一味的推行中國話，不重視臺灣文化的保存。日據時期臺語有專門的報紙、書籍和學校，多多少少對臺灣本身的文化有所保存。因此他希望臺灣自己能夠獨立起來，日本文化不錯，但日本人離開臺灣後，中國文化傳進來，一味的阻止其他文化的發展，臺灣文化定位在那裡？這對臺灣人來說真是一種悲哀。

自食其力的生活

1937年四月，因為陳若瑟神父前往日本學習日語，所以由戴神父正式接任羅厝天主堂的本堂神父。

當時神父住的房子和一般平民的一樣，都是中間為大廳，而兩旁則為房間。中間的大廳是做為神父日常生活的起居室及接待訪客的地方。

因為羅厝天主堂聖母會本身擁有田產，神父的日常飲食來源多是自己在這些田地上種菜、養雞、養鴨，若東西不足時，就到員林去購買。神父會雇用幾位婦人幫他們打點三餐，有時當地傳教的姑婆也會過來幫忙煮飯給神父吃。

當時村中的小孩接受教育的很少，平常就會叫這些男孩子到神父的居所來打打雜，幫忙教堂的一些事，空閒時神父就會順便教導這些男孩學習道理，後來不少成為教會的傳道員，為教會傳教，貢獻心力。如曾在萬金管理聖母會田產的張倫義（臺語音譯），就是羅厝庄出身的傳道員。因此當時神父住的地方，經常都是大門敞開，信徒們自由的出入，與信徒們非常的接近，神父和信徒的感情非常的融洽。

戴神父說，現在不但教堂一個禮拜因為做彌撒才開一次，神父住的地方則是大門深鎖，信徒們也就不常在教堂附近活動，漸漸的有些信徒就不來教堂了。

在羅厝庄時，戴神父因為當時交通工具不發達，利用最方便的腳踏車，每星期輪流到距離羅厝5至20公里不等的所轄的各堂口去舉行彌撒，並且探望信徒。戴神父在傳教事務方面，熱誠又輕快，平易近人，所以教務蒸蒸日上。當時，組織青年會，指導青年，使羅厝青年成為教會中的一支生力軍。

戴神父在羅厝庄任內，也教導陳若瑟神父時期所組成的西樂隊學習羅馬字，並從員林聘請樂師加強訓練和教導樂器的使用，也訂製團服，參加村外的婚喪喜慶等的對外活動，賺取外快，因而吸引不少信徒來參加聖樂隊。同時組織聖歌隊參與協助教堂內的各種禮儀，提高禮節的崇高氣氛，使信徒對教會事務更加的熱忱。

羅厝的見聞

在羅厝的這段期間，在信徒間也發生了一些故事。

庄內有一個信徒叫劉彬（臺語音譯），他有三個兒子，妻子已經過世。劉彬是一個虔誠的信徒，每個星期都到教堂來，但是他的三個兒子卻都不到聖堂來。一天，戴神父就跟這個劉彬說：「你雖然每個禮拜都來望彌撒，但是為什麼你的兒子卻都沒有來？」劉彬就回答說：「我的兒子他們都藉口有事，沒空不來。」戴神父就說：「你還是盡量要他們來聖堂望彌撒。」劉彬點點頭就回去了。但是情形還是如往常一樣。

不久劉彬過世了，就在棺材剛要下葬時，其中的二兒子忽然大罵天主不公道之類的話語，一些信徒都加以勸止，但是仍然不聽，造成信徒對其印象不好。

這件事過後不久，這個二兒子就因車禍喪生，不久大兒子也生病過世，最小的兒子因為看到這種情形，感到害怕而搬離了羅厝這個村莊。他們住的房子也因為如此再也沒有人敢去靠近及居住這間房子，時間一久，房子就荒廢倒塌了。

另外一個故事是，一個當地的信徒背教，戴神父曾多次去勸這位信徒回心轉意，但是都沒有成功。有一次，教會在舉行慶祝遊行，當聖母聖像的轎子經過他的門前時，他就跑出來大罵聖母，戴神父並不知道這件事，事後聽他的鄰居說，當時他在說這話的時候，就同時聽到打耳光的聲音。不久這位背教的信徒也生病過世了。

第三個故事就是，有一個叫劉進財（臺語音譯）的信徒，他經常來幫神父種菜，人非常好，唯一的缺點就是脾氣太過暴躁。有一天，他跟戴神父說，他的女兒跑到臺中去，他要去把女兒找回來。回來後，就很嚴厲的教訓他的女兒，戴神父也都去加以勸止，但是劉進財都不聽。

3、4個月以後，一天他跑來跟戴神父說，他的女兒已經死了，戴神父馬上跟隨劉進財到他家，進門後看到劉進財的女兒躺在床上，神父趨前往死者的脖子下一摸，就跟劉

進財說：「你的女兒已經死了7、8個小時了。」戴神父就向劉進財問明了原委，劉進財說，因他禁止他的女兒出去，他的女兒不願待在家中，所以就教訓女兒，失手將女兒打死。神父跟劉進財說你女兒的個性本身就不喜歡待在家中，就不要強迫她待在家中，而造成今天的悲劇。戴神父對這件事感到很遺憾。

在羅厝的隔壁有一個村莊叫做海豐崙（今彰化縣田尾鄉海豐崙村），騎腳踏車大約30分鐘。當地有一個熱心的信徒，一天跟戴神父說，他們村中有許多基督教徒想瞭解天主教的教理，請戴神父前去講道，當時吸引了許多的基督徒前去聆聽。他們便租了一間房子作為道理廳之用，但是就在進行的同時，當地的日本警察禁止他們繼續進行。因為當時要設立道理廳或教堂在日本政府的規定下都要到各地的州廳申請許可，方可設立。這件事就因為這樣而不了了之。

其他的堂口

前面曾提過，羅厝天主堂另外有其附屬堂口員林、面前崙、大東、蕃子田。面前崙、大東、蕃子田都有許多的信徒，尤其面前崙有一間很漂亮教堂，而且其信徒也不少。光復後，中部教區歸美國瑪利諾會管轄，他們在二林興建一間聖堂，而將面前崙、大東、蕃子田的教堂和傳教所關閉，其地的信徒就必須到二林去望彌撒，非常的不方便。

員林的信徒也不少，當地基本的信徒家庭，計有謝、黃、江、高、張、魏、陳、翁、周等數十家，筆者的嬸婆魏綢就是員林的當地信徒，而且叔公楊玄耀一房現也大部居於員林。

戴神父在員林曾遇到一位自廈門過來的鐘姓姑婆，利用聖堂教導婦人了解天主教的道理。

曾有一次，戴神父親眼看見，有一個婦人在廚房煮飯，而這位姑婆就在婦人的旁邊講解道理。顯示出這些傳教人員在臺灣



圖5 1935年（昭和10年），兩位日本青年致贈紀念品給戴剛德神父和羅道真神父。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老照片數位博物館」館藏
（總登錄號：cca100062-hp-kh2003_008_054r-0001）

天主教傳教史上占了極大的地位，如果當初沒有他們，當時的天主教單純以少數的神父來說，信徒人數無法迅速的發展。戴神父說日本人離開臺灣時，全臺灣共有十二位神父，信徒一萬多人。

員林天主堂在陳若瑟神父的時期，為促進教會青年的團結便創立青年會，而且附設樂隊。戴神父接任後，改組青年會為教導、樂隊、實業三組。臺灣天主教會著名的信徒江傳德（1917~1982）⁴，便是員林人，他曾在戴神父任內擔任此青年團的團長。

初抵臺北

1935年道明會玫瑰省省會長來到羅厝庄，因為當時戴神父向陳若瑟神父學臺語，而且兩人也相當年輕，省會長看到這種情形，就說這樣不行，臺語會學不會，就命令戴神父到臺北與一位老神父學習臺語。

說到這裡，戴神父就有點感慨的說，現在的教會，對於老神父都不讓他們參與一些事務。像一些傳教的方式，其實都應該請教這些老神父，將他們多年的心得和感觸作為參考的憑藉。

另外像教導修院的修生，也應該由老神父來教導，將他們這麼多年所領會的道理，教給這些剛要接觸教會的孩子，而且成效也會比較大。戴神父非常的稱讚中國的長幼倫理，對老一輩的人都非常的尊敬。

1935年戴神父前往北部才剛建完教堂不久的石碇，與洪羅烈神父學臺語，並助理堂務。

石碇位於臺北市經景美往宜蘭礁溪必經山道的入口處，這個地方風景非常優美，當地的居民都是以種茶及樟腦為業，民風純樸，也非常的老實。當時的信徒對神父非常的親切，也非常的照顧，星期天並且會帶茶葉去送給神父們。而且信徒們信仰很虔誠，每晚都在傳道員的帶領下到教堂唸經。

當時有一位傳道員，當地人稱他「牙槽伯」，非常的熱心及虔誠，人有病就叫人喝聖水。曾有一次，有一小孩被魚刺哽到，這位傳教先生就叫他喝聖水，沒想到竟然就好了。這是當中的一個小插曲。

4 江傳德（1917~1982），臺灣員林人。其曾遊學日本，歷任臺灣監牧區、高雄監牧區、高雄教區秘書，及天主教道明會玫瑰省臺灣區會秘書，1982年病逝高雄。著有《天主教在臺灣》（高雄：善導週刊社，1992年12月）。

早期臺灣的天主教信徒，相信聖水具有治療的功效，所以會有這樣的故事流傳，據戴神父回憶，這種情形在萬金也有。每年復活節時，教堂都要準備好幾個大桶子的聖水，供信徒取用，而且一下子都被信徒用容器裝光了，由此可見，臺灣的天主教信徒對於聖水的相信和依靠。

當戴神父到達石碇天主教會時，受到當地信徒們熱烈的歡迎，大家都跑到教堂來看新的神父，非常好客，而且神父如果臺語講錯，信徒還會糾正他，大家相處得非常融洽。

羅厝和石碇的天主教徒，其純樸的民風和對信仰的虔誠，深深的刻畫在第一次來臺灣傳教的戴神父的心中，成為支持他在臺灣傳教的原動力，也對他日後的傳教有極大鼓勵的作用。戴神父更喜悅的回憶說，他來臺灣的當時，是臺灣傳教最好的一個時期。1937年因為羅厝庄的陳若瑟神父前往日本學習日語，所以其缺由戴神父接任。

1941年三月戴神父又被調往臺北的蓬萊町天主堂（今臺北市民生西路主教座堂）擔任本堂，同年的12月8日二次大戰也爆發了。（待續）